



# 《廉吏传》中的廉洁观

郭萌萌 林雅华

自《史记·循吏列传》首开记录奉职循理官吏的风气，汉以后的朝代几乎都会在其正史书写中加列《循吏传》，以彰史治的理想境界。费枢，字伯枢，成都人，徽宗宣和年间进士。绍兴十六年（1146），他以左朝散郎的身份在归州（今湖北秭归）任职，又累官于黎州（今四川汉源）。有感于徽宗朝的政治环境，他编撰的二卷本《廉吏传》专门摘选了春秋至隋唐年间以廉洁奉公而闻名的官员事迹，并加以品评，意在讽励当世，重振廉吏的精神品格。该书现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和《钦定四库全书》刻本。

## 廉乃为政之本，兴衰之所系

《廉吏传》的开篇就回顾了西周时期以廉为吏治之本，用“官府之六计”（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评判群吏的制度。费枢解释自己的《廉吏传》之所以从东周开始，是因为西周时期“上以节俭化臣下，下以行义励风俗”的良好风气在东周不复存在，廉吏由曾经常态化的普遍存在转变为具有特殊性的可贵存在，从而有了被记述的必要。在他看来，周代以来的吏治都以廉为本，而朝代的更迭兴衰与廉息息相关。

《廉吏传》以朝代为界分为九个部分，所列人物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列国廉吏传》记述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依旧坚守道义的廉吏事迹。费枢认为，从诸侯国官吏的行为就可以看各国实力的强弱。《西汉廉吏传》指出汉武帝显扬《六经》使得士人重新重视道德操守，使世人重知礼义廉耻。此传的字言表明，吏治之廉需复兴经典，用圣人之道引导世人之行。《东汉廉吏传》特别强调倡廉需要做到上行下效。作者认为，“天下之民俗常系于士，而士俗未尝不因于时。而人君造时。”光武帝生长于民间而知悉百姓疾苦，亲身力行廉洁勤约，开出清正尚廉的政治风气，引导了当时的士俗与习俗往更为高洁的方向发展。《魏吴蜀廉吏传》中记载三国时，尚保留着光武中兴的廉正遗风，以“清规廉操见称于时”的人遍布各国。而魏、蜀、吴之所以能各自称王，关键在于他们在立国之初并没有丧失道义名声，能够各自团结名臣子孙、名节之士。

（上接1版）  
把握好谋全局与谋一域的关系。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讲的就是要胸怀大局、统揽全局。我们要自觉把一地一域的工作放在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把握，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把握好抓当前与抓长远的关系。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强化战略思维，要求我们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正确处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既立足当下把“十四五”规划执行好、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好，又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制定战略远景、战略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积小胜为大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把握好抓主要矛盾与抓次要矛盾的关系。形势在变、任务在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在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随时可能到来。我们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抓关键、补短板、强弱项，有效防范和化解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与以往的党代会报告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和国家事业布局中，更加突出了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建设、国家安全这三个重要方面，同时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体现了党对抓主要矛盾的战略考量。

把握好重战略与强战术的关系。战略

在《两晋廉吏传》中，费枢论两晋能立而又能绵延的根本原因在于任用廉吏，廉能兴国在南史中也可可见一斑。《南史廉吏传》中写道，清修高洁之士在每个朝代都有，但能让他们屈身作吏的原因是国家有道。南朝时期的宋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而这也是它能够如此兴盛的原因。《北史廉吏传》中，费枢十分欣赏北朝主政者能通过兴礼作乐，修帝王之政的施行，认为这一做法使得北方风物与南方相合，却能保持质朴不染江左靡丽之气，使得怀材励行之士能“多砺廉隅，敦崇风节”，践行节俭朴素操守。

隋朝持续时间太短，而政治并不算清明，所以《隋廉吏传》所录廉吏不过数人。与之相比，唐代由于推行科举制度，且不同的君主虽然好恶不同，但都求贤若渴，所以《唐廉吏传》中所录的人物最多，唐朝的国祚也绵延近三百年。

概览费枢为各代所做小序可见，明君尚廉、国家有道、治理有方是廉吏涌现的必要条件，而廉风之振、廉吏之兴，则能化一国的士风世风，起到兴国安邦的作用。

## 廉乃君子之道，民生之所仰

廉是古代士人追求君子之道必须坚守的道德操守之一，虽然在具体的施行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旨归都是国计民生。廉吏既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家族中的重要成员，更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廉吏传》中记载的大量廉吏以君子之道修身齐家，明情义之辨然后公正裁断、选贤举能，达到以德服众的效果。

君子之道首先体现在限制自己的私欲，让富于民。齐国大夫晏婴深知“利过则为败”，他有感于赋税制度的严苛，提倡限制私利——百姓往用力三分，其中两分上交国家，自己只用一分维持衣食。同样感怀民生多艰而节俭度日的还有楚国令尹斗子文。他深刻认识到用百姓的劳动成果富足自己的行为终会招致灾祸，君子必要先明礼义才能接受俸禄。《廉吏传》还记载了鲁国博士公仪休拔除家里种植的可口蔬菜，烧毁织机，赶走织娘，意在杜绝家人借助富贵的资本与百姓争利的事迹；南朝宋国太守虞

上要坚持持久战，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战略上要站得高、把得准，战术上要接地气、重实效。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针对来自外部的讹诈、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我们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做好战略形势、战略需求分析，因应情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打断。

强化战略思维，关键是把党中央制定的战略理解好领会透，把战略目标转化为可实施的战术纲领，把战略任务转化为可操作的战术行动，把极端情况、最坏境况的战略前置做好，从而在掌握战略主动中赢得历史主动，在进行战略谋划中实现历史变革。

## 抓好战略实施,提高战略能力

战略既要制定好，也要执行好，战略能力的提高必然要以战略实施为路径和抓手。我们一定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理解好贯彻好执行好，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解决推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卡点瓶颈问题，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美丽中

愿在任上不经营产业也是出于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西汉大夫朱邑“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馈”，家中无余财；东汉杨秉“有三不惑”，谓之“酒、财、色也”，将清廉家风传至后代。此外，还有唐代的阿史那杜尔不征收边关赋税，崔士美在任上自出廩钱而市物自给，崔棻在贫地减免税赋、绥招流亡、散钱军中。

君子之道也体现在公正裁断、选贤举能之上。魏伐委婉劝谏父亲退回贿赂，贡禹建议朝廷废除罪制，朱博明察下属私收贿赂，翟方进揭发贵族豪强在工程中营私受贿的事实，李尚隐三入御史台弹劾失职者却始终注意量刑适当。这些官吏善用法律，是廉吏中裁断公正、品行刚正的代表。王丘任考功员外郎时剔除滥竽充数者，而考教真才实学，其采录之精明“自武后至数十年来”无人能比。这些官吏谦逊有节，是廉吏中选贤举能、知人善任的代表。又有如和洽一样的官吏，反感“士大夫故污辱其衣”的故作节俭，率直直言廉洁之风应重修身，以习俗教化，以中庸为贵。

君子之道还体现在明辨情义、推行忠恕之上。有的官员太过耿介而不被看重，有的官员虽然刚正不阿、不受贿赂，但常有不通情理之处，以至于苛责太过，被指责为酷吏。真正受人尊敬的廉吏深谙情义兼顾和忠恕之道。如薛宣兼顾情理，使得过错者辞官谢罪而无怨言；如伯夷不满兄长受贿，以自己的廉洁行为感化兄长；又如范术曾体谅宽恕逃亡罪人及其家小，将他们编入户籍，平一万人乱；还有如唐太宗处理长孙顺德之贪，不因一时过错而抹杀一个人的全部，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此外，不少廉吏表现出逊让的美德，如阮长之始终在灾前即卸职，以便下一任官员能拿到当年的俸禄；张堪将先父遗产让与侄子，所获战利品皆上报君上，自己不取分文。

## 廉可教化乡邻,感化夷狄,传承家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多民族杂居的传统，中原帝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悠久的吏治历史中，廉吏既能以其卓越的能力治理社会，受

百姓爱戴、受君主赏识，又能以美好的品德修养教化一方、形塑家风。

廉吏首先是要以身作则，所以他所到之处，不轻易使用刑法却能树立威信，肃清一地风气。譬如西汉时期，尹翁归不畏权臣的族人家奴，秉公执法，阻止他们为害地方市场，肃清贿赂风气。再如东汉时期的钟离义，他拒绝接受被没收的赃款，认为这些来路不正。又如同时期的吴祐，他在地方任职时实践“仁简”之道，深得人心。即使是当地的番夫，也能在劝阻下惭愧自首，后悔自己私下收取钱财，欺骗府君。

廉吏精神品格的感染力也体现在边境治理中。张奂帮助羌人击退南匈奴而婉拒赠物，正身洁己，在当地树立起威望，后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使边境三州保持安定。孙谦认为，“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尔。”他治理边境不多浪费国帑兵役，以情礼教化为主。此外，还有陆胤治岭南，杜暹使突厥，归崇敬美名远播东夷，范希朝平党项、室韦等一系列地方治理，靠的都不仅仅是武力制服，而是廉吏们所营造的良好风俗对他们的感化。

被选为官吏的读书人往往会成为其在家族的模范典型。正所谓“为其有之，是以似之”，有的廉吏继承先人留下的清正家风，将其发扬光大。如崔玄暉、裴宽、李景让等人继承先人家风，廉洁守正；韦复卿怒斥堂弟收受贿赂有违先人遗德。有的廉吏则以自身美德形塑家风，从而教化乡邻。孙叔敖去世前告诫儿子选择贫瘠的封地，使得家族得以在乱世绵延；裴昭明轻财重教，奉行“遗子黄金满篇，不如教子一经”；李袭誉散财于宗亲，但留薄田于子孙嘱其自立，不要依赖他人；吴隐之节俭的生活状态使得子孙不以贫乏为耻，以至于他们一家将廉洁洁谨为家法，廉吏辈出。

《廉吏传》通过评述春秋以来的众多廉吏事迹，展现了中国传统廉洁观的丰富内涵，书中传达的廉正德行、君子品性和高尚精神，体现出廉洁观深深影响了士人修身、国家治理和社会风气等多个层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们“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从“行列”到“前列”，虽然是一字之变，但这一目标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要运用战略思维选准主攻方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着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要下大力气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要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要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必须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网络、金融、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作者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先河，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弟子周游列国。史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到过胶州，并在胶州境内设台讲学。

## （一）

《增修胶志》载：“辛置村北岭到黄埠岭在胶西七里，上有赴京省大道，旧以此为回车岭，谓孔子观海至此。”《莱州府志》载：“孔子适齐到海，至此回车，故名。”关于孔子到胶州的原因，有两种说法：

一是孔子到胶州看望子夏。孔子的学生子夏在莒父做官，派人专程去迎接老师。子夏任莒父宰，关于“莒父”在何处，有不同说法。《增修胶志》中大事记载：周武王封少昊之裔兹舆期为莒子，都于计。由此得出，周武王封少昊之裔兹舆期为莒子，定都于计。计，就是计斤城，位于今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城子村。公元前770年莒国把都城迁到莒（今日照市莒县一带），“计”成为莒国属城，改名介根。徐志刚在《论语通译》中认为：“莒父：鲁国城邑名，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一说，在高密县东南。”《山东通志》云：“莒始封在莱州府高密县东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时，莒子迁于城阳。汉始封刘章为城阳王，置莒县，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耳。”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认为“《通志》与《大事表》异，《通志》较可据。”胶州已故文史专家郁文光也认为“刘宝楠引《山东通志》（刘按：此书较为正确）云：莒父，在今高密东南，实指胶州的城子村。父，甫也，开始也，即莒之初都”。《论语》中载：“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在胶州任职，曾问政老师孔子，由此可以看来，不排除子夏请教老师并邀请老师来胶州讲学。

二是孔子被齐景公描述的少海美景所吸引。孔子自夹谷（今江苏赣榆县夹山乡汪于村西北）之盟结识齐景公后，两人就结为好友，齐景公经常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之道。据《说苑》记载，齐景公与晏婴曾游历“少海”，景公为“少海”风光之美而“大乐之”，流连忘返。齐景公在与孔子交往的过程中，经常谈及“少海之美”。孔子周游列国，多在黄河中游的魏、卫、陈、宋等国活动，未曾到过海边。等到晚年聚徒讲学，想起景公说的“少海之美”，就带领部分高徒到莒父（古介根城）看海观光，讲经传道。

## （二）

孔子带领众弟子到东夷各国讲经传道，来到现在的胶州地界。一天行走在，忽听到有人在歌唱。孔子掀起车帘，看到一位身穿重孝的老丈边耕地边唱歌。身穿重孝却如此快乐，孔子感到十分不解，便让弟子上前询问原因。弟子走到老丈面前问：“请问老丈，什么喜事让你如此高兴，身穿重孝还要唱歌？”老丈停下犁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双亲活到古稀之年已经金顶入帛，我上无牵下无挂，为什么不高兴？”弟子把老丈的话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东夷之人很有教养，就连一个农夫都能懂这么多的道理。人家老丈上能尊老下能爱小，自己还能自得其乐，安享晚年，我们还

# 孔子传道胶州

潘晓 张雪

去给人家讲什么道理？”于是命令弟子调转车头向南走去。后人把孔子回车的地方叫“回车岭”。

孔子与弟子来到今胶州市云溪河边，看到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孔子对弟子说：“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要无功而返，赶快选个地方为百姓讲一课。”周围的百姓听说孔子要来讲课，很快聚集了男女老少几百人。孔子十分高兴，亲自登台讲课。孔子讲完后带领弟子驱车向东南海边赶去。后来，人们把孔子讲课的那块高地叫“讲台台”，洗砚的泉水叫“洗砚泉”，也就是清光绪年间王葆崇（清胶州人，在京供六品职）为之树碑立传的“西云泉”（位于今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南辛置村前的南云溪河源头）。

## （三）

孔子到达胶州黄埠岭顶的时候，向东望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又回车往南，跨过胶州西云河（今云溪河），转向东南方向走，到了现在的九龙街道办事处地界。当地百姓听说孔子来了，纷纷围拢上来，一些老者恳请孔子讲学传道。孔子答应了他们要求，就讲了一课。为了纪念孔子来此讲课，人们把讲课时所在的村名改为“讲堂沟”，也就是现在的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讲堂沟村”。

孔子在此发现当地百姓朴实懂礼，自己也很受尊重，想返回到海边看看。第二天，孔子带领众弟子离开讲堂沟，继续向东北走去，走出2里多路，遇到一道很陡的岭，车无法通过。孔子叫弟子把车搬了（胶州方言，即把车扔掉），步行去海边。后来人们把孔子搬车的地方叫“搬车沟”，也就是现在的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搬车沟村”。

孔子的思想深深影响着胶州历史文化的发展。汉朝著名学者、“胶东大儒”庸谿，出于对民族文化的钟爱和执着的追求，凭记忆再现《尚书》《论语》原貌，成为一位起到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古文经学大师，庸谿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有十几位。总之，孔子的思想为胶州后代接续传承，促进了胶州的文化繁荣、经济兴盛。

